

An abstract collage of various media-related icons and symbols, including a film strip, a television set, a newspaper, and a camera, rendered in a light green color against a darker green backgro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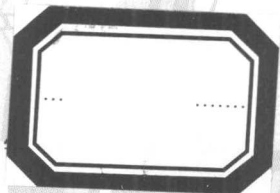
比较传媒史

陈彤旭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书由中国青年政治



比较传媒史

陈彤旭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传媒史 / 陈彤旭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
有限公司, 2014.1

ISBN 978-7-5100-7193-5

I . ①比… II . ①陈… III . ①新闻事业史—对比
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 ① G21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5346 号



比较传媒史

责任编辑 孔令钢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94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7193-5/G · 1496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前言 比较的阐释与比较的叙事

比较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比较的研究方法是最古老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之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即是比较研究的成果。比较方法最简单的逻辑线索就是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比较政治学已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完整的分析框架。比较政治研究遵守价值中立等经验研究的最基本原则,同时又注意并克服在跨国研究中,由于文化背景或政治生活的差异而造成的各种问题。^[1]

《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和《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是一流的比较政治专业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代表国外最前沿的学术发展趋势。^[2]《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倡导用比较研究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研究,涵盖的学科包括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3]

比较出学问。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比较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4]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著作的分析》中,对三位重要学者做了全面的比较,是了解社会学的重要入门书籍。^[5]

[1] 张凌:《比较研究:一种跨文化的政治学分析方法》,载《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2] 熊易寒等:《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7日版。

[3] 徐萍:《〈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简介》,载《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

[4] 马杰伟:《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5] 马杰伟:《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传媒史为什么需要比较？西方学者说：“在我们对传播历程的理解中总是带有一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如何补偿这样的偏差？我们恰好正在不断认识到东方的语言和媒介历程的起源，这令一直把欧洲和北美的有记载的历史作为传播编年史主线的我们多有不妥。”^[1]Hallin & Mancini（2004）在《比较媒介制度：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中提出了三种媒介制度模式：北大西洋自由主义模式，北欧、中欧或民主统合主义模式，地中海或极化多元模式。Robert Mckenzie（2007）在《全球比较媒介》（*Comparing Media From Around The World*）一书中也比较了多国媒介制度。^[2]这两个研究都未将中国作为考察的重点。

本书缘起于《中外传媒史研究》课程的教学。在授课中，经常不可避免地面对中外传媒史的关联与差别，笔者由此开始了比较研究的历程。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层面，也表现在传媒的领域。不同的时代，受众需求不同，传媒也就不同。不同的社会类型，受众需求不同，传媒也就不同。

本书的体系是历史性的、历时性的研究，包含了从文献到个案研究的丰富内容，比较的视角始终贯穿其中。对于传媒史来说，最严谨、可靠的研究态度就是以文献为基础、以文本为准则，在实证材料的比较中得出研究结论。

美国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阐述了比较与错误比较之别。他指出，被比较的两个事物之间应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相异性。他用四个概念来概括比较研究中常犯的错误：①地方偏见（parochialism）；②错误分类（misclassification）；③程度主义（degreeism）；④概念延展（conceptual stretching）。其中，地方偏见是指处于真空中的一国研究，其忽视常规理论或比较分析所认可的通常类型，或者在一时冲动之下就发明某个特别的、自我裁剪的专业术语。^[3]这些提示是非常重要的。比较要慎重，使用比较框架（比较地理区域或学科角度）可能产生一些特别的问题。^[4]

[1] [加]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第五版），董璐、何道宽、王树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 彭怀恩：《比较政治新论》，台湾风云论坛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1页。

[3] [美]乔万尼·萨托利：《比较与错误比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

[4] 余宁平、杜芳琴：《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的全球与区域视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比较的目的是阐释。美国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指出：“目前存在一种共识，即比较研究的特征并不是比较而是解释。跨国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去理解政治现象。”^[1] 由于所有的知识都在寻求一种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因此把比较研究之目的归结为解释是合理的。法国历史学家雷蒙·阿隆在《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中也指出：“说到底，我们只能通过阐释工作来认识或理解过去”，“文献学是阐释学的一种表现或技术手段，因为全部历史就在于阐释”。^[2]

美国比较政治学家阿伦德·利普哈特 (Arend Lijphart) 指出，比较方法的主要问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变量多，案例少。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前者实际上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问题，无论采用了什么样的具体方法；后者是比较方法所特有的，它使多变量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最有效的方法是：把比较分析作为研究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仔细地阐明假说；把统计分析作为第二阶段，在此阶段用尽可能大的样本来检验这些假说。

他也指出，若不考虑案例研究方法，对比较方法的讨论就是不完全的。案例研究的最大优势是，集中于单个案例可以使案例得到深入的考察，即使在研究者可支配的研究资源相当有限的条件下也能做到这一点。比较方法与案例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政治学研究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工具。^[3] 在本书中，报刊名称研究主要采用了统计的方法，而报人世家研究主要采用了案例的方法。

比较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和世界的传媒史都是十分必要的。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指出，历史比较研究要勇于超越、勇于创新。比较性的研究需有明确特定的聚焦点，而不是一般性的泛泛的比较。比较研究包括：共时性的比较，即不同国家、民族等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历时性的比较，即一个国家、民族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这样的比较研究，既需要以专门性的研究为基础，又需要比专门性研究更高、更广阔。^[4]

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在本书的写作中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是科学，

[1] [美] 乔万尼·萨托利：《比较与错误比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

[2] [法] 雷蒙·阿隆：《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页。

[3] [美] 阿伦德·利普哈特：《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方法》，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3期。

[4] 刘家和：《历史比较研究要勇于超越勇于创新》，载《光明日报》2013年5月17日版。

也是修辞。^[1]叙事是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21世纪以来,从叙事史学向问题导向的分析性的历史研究转型,是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路径之一。不过,叙事史学并没有因此衰微,不断有叙事性的历史著作被生产出来并产生重大的影响。历史解释离不开历史叙事,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曾引述文化史名家彼得·盖伊(Peter Gay)的话说,“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琐碎的,而没有叙事的历史分析则是欠缺的”,并用康德式的语言将这句话改写为“历史叙事无分析则空,历史分析无叙事则盲”。^[2]要避免琐碎和盲目,需将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融合在一起,对于比较传媒史来说,关键是将问题阐释以及统计分析 with 传媒史的叙事相结合。

比较的研究方法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学者称之为“学贯中外、沟通古今、融合史哲”^[3]。《比较传媒史》在打通中外文献、提炼问题意识、跨学科分析、长时段的定量统计、图像史学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努力。本书是一项开拓性、探索性的研究,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创新,包括对报刊名称的长时段数据统计,对报人世家社会阶层流动的分析,对报刊漫画的图像史学分析等。本书对国外传媒史文献、传媒史研究方法、传媒史教育的梳理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历史的研究方法相关,本书对政治经济学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也富有新意。

[1] 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2] 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3] 刘家和:《历史比较研究要勇于超越勇于创新》,载《光明日报》2013年5月17日版。

目 录

第一章 比较视野中的印刷文献	001
第一节 古代文献：甲骨、敦煌、木版书、奏折	002
第二节 近代文献：早期中文报纸、东印度公司档案、传教士文件	004
第三节 现代文献：电台纪录、失落的拷贝、西文报纸	008
第四节 当代文献：“文革”报刊及档案	010
第五节 海外华文报刊文献：新加坡、美国	011
第六节 电子报纸数据库	017
第七节 中国新闻史研究参考书资源	021
第二章 比较视野中的数字化文献	026
第一节 数字化报刊文献：资源、发展与利用	026
第二节 数字化广播文献在研究与教学中的应用	032
第三节 数字化电视文献在研究与教学中的应用	037
第四节 “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报道——数字化文献研究的案例	041
第三章 比较视野中的传媒史研究方法	046
第一节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传统	046
第二节 英语语境里的中国传播史研究	048
第三节 英美传媒史研究前沿：文献、选题及路径	058
第四节 海外中国学与传媒史研究	079

第四章 比较视野中的传媒史教育	099
第一节 传媒史课程设置的多样性	099
第二节 传媒史课程的教学方法	106
第三节 传媒史教师的多元结构	114
第四节 传媒史教学的网络资源	117
第五章 比较视野中的早期媒介	123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中的口语传播	123
第二节 具象符号与抽象符号	125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中的手抄媒介	129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中的报刊名称	138
第七章 比较视野中的报人世家	184
第八章 比较视野中的记者与作家	211
第九章 比较视野中的报刊漫画史	220
第一节 巴黎和会时期的《大公报》新闻漫画	220
第二节 美国 19 世纪末黄孩子漫画史	224
第三节 西方报刊漫画中的报人	234
第十章 比较视野中的传媒业电影	237
第十一章 比较视野中的区域史与传媒史	248
第十二章 比较视野中的政治经济学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262
后 记	272

第一章 比较视野中的印刷文献

印刷文献是传媒史研究的基础。本章主要记述和评析海外图书馆有特色的中国报刊及相关文献收藏、电子报纸数据库、中国新闻史研究参考书资源等,目的在于寻觅他山的宝藏,分析海外文献资源的特点,指出其中对国内学者有价值的部分。这些文献不但海外访学时可以使用,其中有些也可在国内通过互联网在线使用,对于国内的传媒史、历史学研究者以及教学有非常实际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史学者对海外中文文献的运用是引人注目的。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的唐代“进奏院状报”研究使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书价值得以发挥,是古代新闻史的一项重大成果。^[1]复旦大学黄瑚教授根据大英图书馆收藏的《飞龙华报》所做的研究改写了近代欧洲华人报纸的历史。^[2]新加坡学者卓南生教授在大英图书馆的发现对中国近代报业开端的研究做出了贡献。^[3]

尽管如此,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传媒史文献的利用迄今还是有限的。关于海外文献在各大洲的分布情况,目前没有系统的文章介绍;至于如何利用这些文献,也还认识不足。

为更多地了解有价值的海外文献,笔者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查询,获得关于文献的丰富信息。本章与同行共享文献查询的路径,并且在诸多文献中凸显与传媒史有关的研究线索。本章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对传媒史有直接研究价值的报刊,

[1] 方汉奇:《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2] 黄瑚、范书杰:《新发现的欧洲第一份华文报刊〈飞龙报篇考〉》,载《新闻大学》2004年春季号。

[3] [新加坡]卓南生:《自序》,载《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还包括相关的文献，如传教士文件等，这些材料也有研究价值。近年来，传媒史的研究范式趋向丰富，材料的范围也相应地需要扩展。

海外中文文献，从这个词语的界定来说，外延是很广阔的，除报纸、杂志、档案外，还包括古籍、文书、简帛、现代书籍等类别。但从传媒史研究的角度来讲，有价值的主要是前面几种。收藏较丰的机构主要是国外一些大学的图书馆，还有公共大型图书馆。一些国外大学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收藏丰富，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章介绍海外特色文献的分布，是一个“文献地图”，也提供一些研究线索和思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传媒的历史所做的许多研究，是建立在文献资源之上的。

第一节 古代文献：甲骨、敦煌、木版书、奏折

海外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献，主要是 19 世纪以来从国内收购的文物和书籍，有些是国内稀缺的。这类文献主要保存在西方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和图书馆中，因为它们正是汉学研究起步较早的机构。

欧洲收藏中国文献起步最早。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亚洲部最出色的收藏包括中国古代的绘画、瓷器、漆器、玉器以及敦煌的佛教艺术品等。^[1] 博物馆所擅长的并非印刷品，而是器物，因此对于传媒史的意义主要是从器物的图像和符号角度进行研究。

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是敦煌经卷在西方的主要收藏地点。我国古代新闻史研究方面的重大发现——沙洲“进奏院状报”的原件就是来自这里。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文献流失海外的非常多，而且收藏分散。为了方便学术界的工作，近年在敦煌研究领域提倡国际合作，一是影印敦煌文献出版，二是建立了“国际敦煌项目”。“国际敦煌项目”（IDP）^[2] 是一个开创性的国际性协作项目，旨在整合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目标是使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其他考古遗址出土的写本、

[1] 大英博物馆网址：<http://www.britishmuseum.org>。

[2] “国际敦煌项目”（IDP）网址：<http://idp.nlc.gov.cn>。



绘画、纺织品以及艺术品的信息与图像能在互联网上自由地获取，并通过教育与研究项目鼓励用户利用这些资源。“进奏院状报”写在《季布骂阵词》的背面，笔者在“国际敦煌项目”的主页上查到了好几种“季布歌”，看到了这首古代长篇叙事诗手写卷的生动模样，但看不到写在它背面的进奏院状报。

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东方收藏(Oriental Collections)^[1]包括五个主要部分，依次为：中国，日本和韩国，近东和中东，印度和东南亚以及“泰勒特藏”。由此顺序，可见“中国收藏”在其中的突出地位。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中国收藏”始自1632年，那年该馆入藏了第一本中文书。第一笔大批收藏是在1886年，剑桥大学第一位中国研究教授韦德爵士捐献了4304册书籍，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中国的收藏开始系统化，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该馆目前的主要收藏包括甲骨（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3世纪），超过10万册的图书（最早到公元12世纪，包括木版书和拓片），以及古代文献的缩微胶卷。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缩写为RAS)收藏了许多关于中国的古代文献。^[2]该馆不是公共图书馆，主要为会员服务，包括个人和图书馆会员。其他读者需提前预约，方能获得阅读准许，阅读时间也有限制。该图书馆收藏的地理范围包括亚洲全境，从最西的土耳其到最东的日本，从最北的西伯利亚到最南的印尼，还包括一部分北非伊斯兰的文献收藏。它的收藏文献年代覆盖几千年，但最近50年的不在内，古代中东也排除在外。中国和印度的文献，关系着文明的起源和古代的历史，因此都包括在内。文献涉及的学科范围广阔，包括人文学科，如历史、政治、宗教、哲学、语言、逻辑、文学、艺术和地理，也包括自然科学，如数学和天文学。其中，中文图书有5000册，这些书相当有历史，1889年已编辑了详细的目录。

此外，欧洲汉学图书馆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inological Librarians, 缩写为EASL)^[3]的主页上有一个“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资源索引”(Internet guide for Chinese studies)^[4]，从这里可链接到一些古籍资源库，如在线《四库全书》等，可用于中国传媒史研究，比如我们想知道《四库全书》中出现了多少次“传”字，可

[1]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网址：<http://www.lib.cam.ac.uk/readershandbook/D6.html>。

[2]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AS)网址：<http://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

[3] 欧洲汉学图书馆协会(EASL)网址：<http://www.easl.org/easl.html>。

[4] “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资源索引”网址：<http://www.sino.uni-heidelberg.de/igcs>。



以在电子数据库中查询。

美国传教士和探险家虽然比欧洲人起步晚，但是从 19 世纪中叶以后，频繁往来中国，100 多年中也建立起了丰富的收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图书馆的中国文献收藏丰富。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有清朝的奏折，以及雍正、康熙、乾隆等皇帝的手批^[1]，并把它们命名为“宫廷记忆系统”（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1967 年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博士生吴秋良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有“内阁大库档案”电子数据库，使用者可在线浏览。

文物学家钱存训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任馆长多年，他以这里收藏的关于甲骨、纸、笔等的大量文献为基础，完成了他的名著——《书于竹帛》^[2]。这可以被我们视为一部古代中国传播媒介史，因为里面讲述的是中国人使用各类媒介传播文字的历史。他详细地分析了竹简、木牍、纸、墨、笔等的由来，以及古人使用的方法，非常完备全面，富有科学精神。《书于竹帛》也是对文献再加工的出色个案，作者使用了文物期刊和考古报告。

第二节 近代文献：早期中文报纸、东印度公司档案、 传教士文件

海外收藏的近代文献，对于研究中国新闻业的起源有重要意义。有些文献稀有而宝贵，如早期中文报纸、东印度公司档案、传教士文件等。这一时期的许多海外文献，是国内没有的。

一、早期中文报纸

近代中文报纸主要收藏于国内图书馆。但是由于战乱等原因，一些近代报纸的原件在国内难觅踪迹，因此有些西方图书馆的收藏是值得重视的，某种程

[1]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网址：http://www.columbia.edu/itc/sipa/zelin/pages/kangxi_succession.html#quianlong。

[2]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



度上可弥补国内收藏的不足。下面我们看看一些著名的国外图书馆近代中文报纸的收藏情况。

美国芝加哥大学何炳棣教授在他的学术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顾了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经历，他强调原始资料对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何教授提到，美国东部三大汉学图书馆分别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笔者以为最佳的汉学图书馆未必是最佳的报刊收藏地，因为各图书馆有自己的收藏侧重。报刊年代偏近，可能不被某些图书馆重视。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宏富，该馆关于中国的收藏主要放在“亚洲类”的“中国部”，关于中国法律的文献则放在法律图书馆的“远东类”中。该馆的中国收藏始于1869年，当时偶然从中国获得一批文献，有900多册；1912年收藏进一步增加；1928年建立了中国文学分类；1945年又从重庆获得一大批文献。经过多次多渠道的扩充，到1975年已经扩展到411 963册的规模。1972年以后，由于重建了与中国图书馆的联系，资料又进一步丰富了。

该图书馆的中国收藏，现有65万册书籍、手稿和印刷品，12 000多种期刊，从1870年至今的超过1 200种报纸（包括在世界各地出版的主要中文报纸）。其中有400种期刊[如《东方杂志》（1904—1948）]和150种报纸制作成了缩微胶卷。这里有数量众多的报纸期刊原件，我们如果到那里耐心搜寻，一定会有可喜的收获。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国收藏已经走过一个半世纪的历程。该图书馆自称有西半球最丰富的中国研究方面的收藏，又号称是中国以外最大最好用的中国收藏。它的确有过人之处，表现为除中文外，还有英、德、法、俄、日和其他语言的有助于中国研究的文献。该馆在“地理和地图类”收藏有旧的中国地图；在“照片和印刷类”收藏有许多罕见的中国照片和精美的印刷品；在“手稿类”收藏有传教士文件、贸易公司文件和私人外交、军事文件等。这些收藏有可能对中国传媒史研究做出贡献。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是丰富的报刊收藏库，有大量中文报纸、期刊和书籍。^[2]

[1]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2] 李欧梵：《我的哈佛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网址：<http://guides.library.harvard.edu/harvardyenchingarchives>。



单就中文报纸来说,哈佛大学的其他分馆,如法律系图书馆和东亚中心也有一些收藏。而就数量、质量来讲,还是燕京分馆最为丰富。燕京分馆的中文报纸按出版年份排列目录,方便使用;报名多数用拼音标注,同时也有文字;年代越近的越排在前列。根据该目录,笔者检索了该馆历史久远的报纸,发现的确是有罕见的报纸。年代较早的报纸有《华字日报》(香港)、《汇报》(上海)、《日知报》(北京)、《神州日报》(上海)、《泰晤士报》(中文版)(天津)、《同文沪报》(上海)、《字林沪报》(上海)、《画图新报》(上海)、《申报》(上海)、《香港中外新报》(香港)、《上海新报》(上海)、《飞龙报篇》(伦敦)^[1]、《游戏报》(上海)、《闽报》(福建)、《湘报》(长沙)、《京报》(北京)、《民国日报》(上海)、《亚细亚日报》(北京)、《译报》(上海)等。该图书馆收藏中文报刊文献丰富,有些很有价值,可仔细搜寻目录以及实地访问。这些稀有报刊文献不都是原件,有些是胶卷,在报刊目录上有相关说明。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477种中文报纸中,包括当代的(20世纪50年代至今)报纸,有全国性的报纸,如《大公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等,也有各省的地方报纸。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有“香港特藏”(Hong Kong Collection),包括香港出版的800多种西文书籍与期刊,以及228 000页报纸(包括早期香港报纸)的胶片,系1997年由香港政府赠送。

要查阅香港早期报纸,还是香港本地最为丰富。香港公共图书馆2004年3月编制了一个馆藏报纸目录,名称叫“香港报刊及文献缩微资料介绍”(Introduction to the Microform Collection of Hong Kong Newspapers, Periodicals & Documents),可供参考。

二、东印度公司档案

“东印度公司记录”是大英图书馆^[2]的独到收藏。“东印度公司记录”是1947年以前伦敦行政部门的文献档案,是对东印度公司在早期(1600—1858)以及后来如何控制印度、缅甸和其他英属海外机构的记录,作为英国公共记录

[1] 《飞龙报篇》是复旦大学黄瑚教授在大英图书馆发现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也有收藏。

[2] 大英图书馆网址: <http://www.bl.uk/collections/iorarrgt.html>。



的一部分对公众开放。“东印度公司记录”对于了解早期英国传教士和商人在华的活动有重要价值。这个记录不仅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广州的工厂记录（1623—1841）等，对于了解广州的商业性报纸也有意义。广州最早出现的英文报纸是商人办的，现在虽然已知其名称和大致内容，但对其背景还需要更多的认识，“东印度公司记录”在这方面是相当有研究价值的。更重要的是，由于早期来华传教士与东印度公司有关联，这个档案对于研究传教士办报活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传教士文件

传教士是最早在中国办报的主力，最早来中国的一批新教传教士是英国的，因此英国传教士文献对于了解中国新闻业的发端非常有价值。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英国唯一一所关于亚非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该学院的中国收藏覆盖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包括 12 万册印刷品和许多缩微胶卷，还有大约 5 000 种杂志和报纸，以及 1 100 种 1949 年以前的地方志，600 种丛书。这些收藏主要是用汉语写的，有些是用英语，还有些用欧洲其他国家的语言，另外也有蒙古语、藏语、满语等，不仅语言丰富，年代跨度大，数量也很多。亚非学院的特殊收藏中有一个专门的“马礼逊特藏”，最早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莫里森博士（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马礼逊）收集了 800 多种中文书，主要是 17—18 世纪的木版书。

国内学术界以往对美国传教士文献注意不够，一是因为美国人来中国较晚，二是因为国内缺乏这方面的记录。其实美国人虽然比英国人迟些来到中国，但是采取的是对中国城市和上层社会渗透的政策，所以对中国传媒史的影响不可低估。这里介绍几种海外的美国传教士文献，有助于拓展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有早期中文传教士作品汇集《中国和新教徒使命》专题，包括数百份在中国传教的 19 世纪美国新教传教士的作品。这是一套缩微胶卷，来自许多传教士经长期而细致的语言学习后用中文写成的出版物，其范围从宗教课本到世俗知识短文皆有涉猎。传教士们对中文的应用虽欠典雅，却也颇具吸引力。该汇集还包括许多中文期刊，还有《圣经》的早期译本和神学作品，基督教会的历史书籍，旧的字典和罗马方言的书籍，以及有关西方的早期历史、地理和科技中文书等。这是研究美国新教徒在中国传教的历史，中国的现代化及其

同西方关系的珍贵资料。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伯兹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记录》(*The Chinese Recorder*, 1868—1932)对研究在中国的传教士活动来说是一份珍贵的资料。《中国记录》是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间发行的一种英语月刊。它在中国传教活动活跃、西方努力将远东基督化的全盛时期起着连接东西方的作用。收藏提供了有关传教士个人情况和传教活动的信息,详述了他们在传播福音、教育、医疗和各项社会活动中的情况。^[1]

第三节 现代文献:电台纪录、失落的拷贝、西文报纸

海外收藏的现代中文文献虽然距今年代较近,有些也是弥足珍贵的:①有些文献记录的作者是来华外国人,其视角与国人不同;②近代以来中国多战乱,有些珍贵的文献流落到了海外。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国报业总汇和相关出版物”(Chinese Press Summaries and Related Publications, 1944—1950)专题,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的杂志《中国新闻评论》,以及延安广播电台的纪录稿、新华社发布新闻的纪录稿。因为当时的广播不能录音,这些文字纪录稿就显得格外珍贵。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原始记录,可以作为国内研究资料的补充。

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南京交通史”(1930—1937)专题(缩微胶卷),包括1865—1925年的大量有关现代中国交通和通讯史的政府文件,是由中国通信部在1930—1937年出版的。专题分为六部分:邮政管理、航空、航海、道路管理、通信管理和公共事务。这些资料对于考察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都是一个丰富的资源,也可用于对中国传播技术变迁的考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收藏有10万册书、6000册报纸、10000册《文史资料》、1800部电影、300种年鉴、300种期刊,并且正在努力增加电子收藏。该校以大量的中文文献作基础,成为世界闻名的“上

[1]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网址: <http://www.library.utoronto.ca/robarts/microtext/collection/pages/chinaprm.html>。